



民国时期广东学人与中国西南研究

Guangdong's Scholars and the Southwest China
Stud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王 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国时期广东学人与中国西南研究

Guangdong's Scholars and the Southwest China
Stud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王 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广东学人与中国西南研究 / 王传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325-8950-0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西南地区—民国 IV. ①K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2009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民国时期广东学人与中国西南研究

王 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2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950-0

K · 2530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现代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思历程	11
第一节 “从幽谷爬上平地”	11
第二节 西南研究会与《西南研究》	14
第三节 西南学的提出	21
第二章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中国西南研究	27
第一节 语史所的成立及其工作旨趣	27
第二节 西南族群社会的田野调查和研究	34
第三节 西南研究的新风	50
第三章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西南研究	54
第一节 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建置	54
第二节 田野调查研究的拓展	59
第三节 学术成就及影响	72
第四章 史禄国与云南民族调查	82
第一节 “云南调查事件”中的史禄国与傅斯年	84
第二节 “反对者”的声音	93
第三节 被“疏离”的一流学者	100

第五章 杨成志与中国人类学“南派”	103
第一节 留欧游美	103
第二节 缔造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105
第三节 新学术流派的诞生	116
第四节 承上启下：梁钊韬与中山大学人类学	136
第六章 王兴瑞的西南区域社会史和族群社会研究	144
第一节 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与实践	145
第二节 南方族群社会的调查与研究	158
第三节 学术研究特色	166
第七章 江应樑对西南社会的调查和研究	172
第一节 西南农村社会的田野调查与成绩	172
第二节 著述特色	180
第八章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194
第一节 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	194
第二节 人情世故与学术歧见	200
第三节 “国族”构建与“民族”研究	205
第四节 学术与事功的分合	214
参考文献	219
后 记	233

绪 论

一

近年来,民族走廊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加强相关研究,对于促进中国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发展、稳定,增进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西南幅员广阔,物产富饶,族群分布异常复杂,无论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等哪一方面来说,都有其独特的异于他省的实像。自古以来,不同族群在西南区域范围之内进行频繁的交流互动,使之逐渐形成了一条民族走廊。这个走廊是西南地区对外交流融合的重要孔道,也是中国目前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因此,了解西南区际和族际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历史互动融合的过程,对于促进西南经济发展、增进民族和谐均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从学理上总结前人关于西南研究的得失成败,先因而后创,对于中国人类学和史学的发展 also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西南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因涉及人类学(含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故而属于交叉边缘学科研究,常为人所忽视。国内外的史学史研究,大多纯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以及最近的史学趋势为范围,侧重史学成果的分析评论,较少论及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史学发展造成的影响;同样,当前的人类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将其框定在人类学自有的学科脉络之中。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均忽视了由西方传来的人类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进步,离不开西方学术的刺激以及对其的因应与吸纳。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也是在中外学术摩荡融合的情境之下发生的,

除了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之外,西方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揭示其与传统史学的互动勾连,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特质。要言之,如果离开西方分科治学对中学影响的学术背景,仅论及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孤立地观察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仿若冥行擗埴,扪烛揣钥,实未得真相,无法厘清近代史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西南研究始于对西南族群的调查与研究,最初只是少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从事的一项学术研究工作。抗战军兴,国家的财力、人力都集中于抗战,致使学术界整体的研究工作前后不能相接,或者进行迟缓。不过,边疆民族研究并不包括在内,尤其是西南边疆民族的研究——这与其他领域的情况恰然相背,因而成为政学军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众所周知,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各学术机关亦相继迁至后方,大批从事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专家也来到后方。抗战建国,开发西南,首先从认识和了解西南开始,于是西南边疆考察团风起云涌,获得了相当珍贵的边疆族群社会的研究材料,西南研究的成绩突飞猛进。

这一时期,拥有各种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利用地理之便,从事深入的田野调查,将中国本土的史学学术传统融入西来的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新知当中,分别从文化、社会、族群、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西南,西南边疆的真实面貌开始显露于世,“西南边疆是学术研究的宝库”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以致学界有人提出了“西南学”的概念,指出举凡研究西南诸省区域内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成为专门学问,凡属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可总称之为“西南学”。

由于学术深受政治的影响,西南研究几乎成为一种显学,一时风起云会,学界莫不以谈西南研究为识时务之俊杰,以致除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与边疆社会有密切关系之外的一般不相干人士,也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座谈西南问题,以自列于通达之流。揆诸史料,至少由研究的规模上来说,实有“空前绝后”之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个人或学术机关组织的调查活动猛增,二是有关西南研究的著述与刊物空前增多。当然,这种现象对于西南的学术研究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幸运,可是这种无计划的调查造成了旷费时间、浪费公帑、工作重复,且调查人员缺乏必要的调查理论储备和调查训练,使得调查与研究浅尝辄止,正式发表的调查报告或专论并不多见,甚至出现“完整的调查报告与专著少于当时研究机构成立之数目的怪现象。另一怪现象是国人喜凑西南研究的热闹,公私机关的边疆考察团难以屈指,

川康云南的道上,各团体成员去来摩肩接踵,使边区人士,目眩神摇,应接不暇。甚至有些团体,原来本是临时组织的一群“乌合之众”,至考察完毕,便各作“鸟兽散”,而有始有终、有“华”有“实”的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并不多见。况且,那些西迁来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调查和研究工作,大都随着战事结束后高校陆续回迁而归于消散。

难能可贵的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部分文史专家,利用地理之便,对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调查和研究,在学界独树一帜。他们的研究工作,呈现出将西来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新知融入传统史学研究当中的特点,对于当代史学研究的跨学科科际整合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广东成为彼时中国西南研究的重镇,这是本书稿以“广东”为中心讨论民国时期中国西南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另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以“民国时期广东学人与中国西南研究”为题,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本书所讨论的西南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分别来自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也有不少学者同时具有多种学科的背景,因而,笔者很难以某一具体的学科对他们的西南研究领域做出规范,所以用生活在广东的学人来概括这些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更加贴近实际。二是民国时期关于中国西南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其内容涉及西南民族史、社会经济史、考古学、民俗学、边疆历史地理等诸多领域,因此对于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只能以“西南研究”来加以概括。

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民国学人在西南族群社会研究中形成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成绩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民国史家对于西南地区族群社会历史的调查和研究,搜集、整理了大批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体质等方面的一手材料,为我们今天认识西南族群社会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贡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学界的社会形态论争,成为建国之后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所资取的宝贵历史资源。

其次,在中西学摩荡融合的背景下,居住在广东的民国学人,在西南社会历史的研究实践中,将西方舶来的人类学学术新知融入本土史学传统当中,逐渐形成了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学的文献分析相结合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传统史学与人类学的自然结合表现得和谐而富于创意,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代史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最后,民国史家积极提倡西南社会研究,乃至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

问——“西南学”，西南学是近代西南研究趋于高潮的产物，反映出南方学界将西南社会中的某些文化特征看作是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遗存，因此，宏观上把握西南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对于理解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民国学人还又考虑到西南大区之间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差异，对广东、四川以及西南边疆族群社会文化各自的特点进行了阐述，这种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取径，对于当代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本书以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两个学术机构的部分史家为中心，讨论中国西南社会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关于民国时期广东学人的中国西南研究的既有讨论，下列著述最为重要。

学界对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称“语史所”）西南族群历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是著指出杨成志的西南民族调查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深入程度及内容的专门化方面，都是民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施爱东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与早期西南民族调查》（《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指出辛树帜领导的广西民族调查，是有组织的团队调查，提供了科学分工与合作的新范式，杨成志的西南田野调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刘小云的《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指出杨成志是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先驱，他以中山大学为依托，训练出一批研究西南民族的杰出人才，中山大学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此类研究均肯定早期西南调查的典范意义，而未见其不足之处。

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领导的西南民族调查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桩公案，对于该案的研究，学界持有四种观点。一是费孝通在《人不知而不愠》（《读书》，1994年第4期）中指出史禄国在西南民族调查活动后被中国学界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大多不能读懂这位“世界级的学者”；二是台湾地区学者苏同炳的《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学生书局，2012年），指出史禄国临阵脱逃，玷污了“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声誉，而傅斯年为了顾及史语所的面面，多方为之文饰；三是何国强的《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持论比较公允，认为史氏在云

南调查中提前离队,应该批评,但理性来看,史氏有家属在身边,故不敢冒险,此乃人之本性,并非史氏之胆怯,相反,正因史氏的胆怯,衬托出杨成志的可贵精神,成就了他后来的创举;四是刘小云的《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揭示了民国学人当时对人类学认知存在个体差异,尽管许多学人的治学观念已有所转变,但在具体实行时,仍然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知识的牵绊。以上研究中,费先生的回忆文章虽从史氏的个性和学术风格入手分析,但其中不乏夹杂着复杂的感性认识在里面,缺乏说服力;其余三人的文章由于引用的材料均来自杨成志一方,受材料的限制,忽视了史禄国作为该事件主角的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的表达,所得结论不够客观,最终也未能为这桩学术公案定讞。

学界提及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相关论著,主要是陈序经的几种传记和伍锐麟的调查报告集序言。如陈其津的《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夏和顺的《全盘西化的台前幕后:陈序经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郑潮波的《固守教坛:陈序经的人生之路》(海南出版社,2008年)、何国强为整理伍锐麟的调查报告集《粤海虞衡卅一秋》(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而撰写伍氏的《逸事述略》等。这些论著均为对陈序经、伍锐麟在岭南大学时期工作和学术的介绍,但对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建制、运作以及在西南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及影响未曾涉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策划“五省自治”,华北、平津危急。为了粉碎日寇分裂中国的阴谋,以傅斯年、顾颉刚为首的学者,在学界发出“中华民族是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同行的质疑。目前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辩论的研究,主要有周文玖、张锦鹏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该文对顾颉刚、白寿彝、张维华、费孝通、翦伯赞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做出了系统的梳理,指出这次论辩是20世纪史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页,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文玖又发表《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指出这次论争,对新中国建立后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理论,以及白寿彝“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一年,黄天华在“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文(《“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2007年8月),认为周文玖两篇文

章没有放在当时的时空语境下去解读这场争论,某些叙述不够准确,判断有失公允。他本人则从顾颉刚、费孝通、翦伯赞等人的民族观入手,分析其异同,解释论辩的缘由,最后指出论争各方“民族”观念的流衍与融合。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周文玖之前的两篇文章,黄天华的文章除了在背景交代上略胜一筹之外,在主要内容和观点上并未超出周氏的论断。此后,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发表《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回溯了20世纪30年代末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认为这是一次关于“民族”定义和是否保留“中华民族”提法的讨论,其对今后应当如何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维持、巩固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最近两年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黄克武讨论了抗战时期傅斯年、顾颉刚、吴文藻、费孝通、翦伯赞等人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辩,他认为这场论辩的主旨是寻求国人之“团结”,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引发了分歧。分歧的背后是蒋汪内部与国共之分歧及权力的斗争(《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李大龙指出抗战时期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实则是一种表象,其背后的关键原因是论辩双方在对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时出现了偏差,西方的“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历史上族群聚合的历史及其带给中国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以上六篇文章视野开阔,资料翔实,也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们均将这次论辩的焦点集中在顾颉刚、白寿彝、张维华、费孝通、翦伯赞等少数几个人物身上,对于同一时期以杨成志、吴宗慈、江应樑等从事于西南民族调查和研究的南方学人提出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则完全没有涉及。另外,傅斯年等人提出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历史背景,除了日本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之外,尚与1930年代末日本在幕后支持泰国提倡“大泰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国西南边区的傣族聚居地密切相关,而这些在以上的几篇文章中则未能涉及。

综合而论,先行成果对民国史家与西南社会的研究有所涉及,然不足之处亦很明显。一是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杨成志、史禄国的早期民族调查的个案研究,而对南方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在西南研究中的贡献缺乏综合集中的分析讨论。由于受史料的限制,对史禄国在西南民族调查中的具体

评价尚未能有定论。二是过去学界对民国时期西南研究的成绩大多肯定,缺少批评性研究,也未能总结这一时期中国西南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不利于当前学界吸收民国时期的学人在中国西南研究中所获得方法论上的学术遗产,从而为中国史研究的再出发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

本书以广州学界为中心,专门探讨民国时期广东学界对西南研究的学术史,相对于学界之前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有下列几处略有可述:

第一,清季民初,在合“华夏”与“四裔蛮夷”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西南民族研究”,抗战爆发后,其研究对象扩展为整个“西南研究”,乃至最终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西南学,民国史家西南研究对象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受到政治和学术发展的双重影响。

第二,在学术转型时期,中国人文科学自身发展没有催生出现代方法论体系,面对西学东渐的强大冲击力,从事中国西南研究的史家只能借助于移植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论来实现对中学的改造,但对于西学精髓的把握难免有“肤浅”之处。

第三,“云南调查事件”发生后,俄裔学者史禄国受到学界诸多非议,反映在学术转型时期,彼时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狭窄,对国际学术新潮的把握严重不足;而现下学界则在研究材料的选择上,也忽视了史氏作为该事件主角的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的表达。

第四,“历史人类学”不是西方舶来品,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取向,也不是当下学界才有的学术理念。自人类学进入中国之后,在中国西南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历史文献分析与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自然地结合,表现得和谐而富于创意,并未见后来一些研究者人为制造的那种紧张。

“史无定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问题。本文采用传统史学史研究中以人物为中心研究的同时,尤注意学术机构的研究,通过以中山大学语史所和岭南大学西南调查所的运作理念和学术实践为考察视角,由个人扩大到群体,力图阐述两个研究所的同仁在中国西南学术研究中的成就及影响,努力揭示出研究所同仁的学术理路和学术诉求;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但又不

完全停留在关键词的检索上,注意分析关键概念的使用与学术政治变迁的内在关联性;在内容的设计上,不追求“大而全”,“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专题研究为主所设计的若干专题,既要考虑其学术价值,又需要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从而真正推进该领域的研究进程。

最后,本书主要以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具有某一特定治学风格或倾向的学人及其学术活动为研究对象,为使全文论述在概念上不致产生歧义和误解,特在此对文中多次出现的“西南”这一概念作一简要说明。

“西南”作为中国境内某一疆域方位的特指,其内涵较少受到自然地理单元划分的限制,而一直处于复杂的动态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关研究表明,自西汉时期起,就基本奠定了以“川、滇、黔”为西南的核心区域。至明代,广西也逐渐体现出“西南”省份的稳定地位,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亦常被纳入该区,但尚不稳定和明确,似在“亦此亦彼”的游移状态中。近代以来,“随着川、滇、黔、桂、粤、湘、鄂等省呈现出沿边、沿海、沿江三大自然地带的联通关系,上述省份的内联性得以加强,以‘西南’之一大区概念对其加以明确表述即成必要”。因此,在清末民初就已逐渐形成西南“六省说”(川滇黔桂粤湘)和“七省说”(川滇黔桂粤湘鄂),其中前者成为当时社会对“西南”范围的一种主流看法。^①

同样,具体到作为南方的两所学术重镇——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专家学者,也基本上采用西南“六省说”。早在1928年,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顾颉刚在一篇改作的《请纂修〈广东通志〉提案》中,就将广州作为“西南各省”之一。^②1932年杨成志等人在广州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该会以“唤醒政府及民众注意西南边疆问题与设施计”为宗旨,认为“我国西南范围,包括粤、桂、黔、滇、川、西康及西藏”;^③1937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研究生江应樑在《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中将西南民族的地域主要分布定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诸省”。^④陈序经在《西南文化研究的意义》一文中,认为西南研究的范围包括湘、黔、川、滇、桂、粤乃至海南等省份,^⑤该文也作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概况》的附录,用来说明西南研究的重大学术意义;另外,岑家梧在《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一书中,也

① 张轲风:《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顾颉刚:《请纂修〈广东通志〉提案》,原载《香港华字日报》,题《朱家骅请纂修〈广东通志〉》,1929年1月8日,收入《宝树园文存》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4页。

③ 本会同仁:《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成立宣言》,《西南研究》创刊号,1932年2月10日。

④ 江应樑拟,杨成志指导:《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年7月8日,第7版。

⑤ 陈序经:《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社会学讯》第7期,1948年4月20日。

将湘、粤、桂、川、黔、滇作为西南民族研究的地域范围。^①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西南”作为一个大区概念与我们今天的西南的区域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其中还包括了广东、湖南两省。

^① 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序》,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甲集第七种,1949年12月,第1页。

第一章 现代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思历程

自清季民初以来,国人对于西南的关注与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晚清时期,国人鉴于英法以安南、缅甸、印度为前哨、跳板虎视中国,遂呼吁加强西南边疆的国防建设;时至民国前后,随着西方民族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学者开始对西南民族进行零星的调查和研究;现代意义上的西南民族研究兴起于1920年代末,尤其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全国主要的高校及研究机构陆续西迁,大批学者随之组织调查团队,深入高山纵谷,探求西南民族的体质、语言、文化及历史演变之轨迹。不过,这些调查大都随着抗日战事的结束和高校陆续迁回而归于消散。

事实上,在中国的西南学术研究的团体或个人中,只有地处西南的两所学术重镇——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中,以杨成志、江应樑、王兴瑞、陈序经、伍锐麟为首的学者在西南社会坚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调查和研究。他们走出书斋,经年累月奔走于乡野民间,凭借深厚的学术积淀,加深了南方学界同仁对中国西南区域社会研究重要学术意义的认识。1948年底,江应樑代表南方学界系统地提出了建立“西南学”构想,这对于中国现代西南社会研究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鉴于这一构想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笔者不揣浅陋,借助于概念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段中有关中国西南学术研究的三个重要概念——“西南民族研究”、“西南研究”、“西南学”作历时性考察,探析其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涵,重构民国时期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思历程。

第一节 “从幽谷爬上平地”

中国南方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广、种类多的特点,蕴藏着丰